

“汉学的典范转移与比较文学”研讨会

时间：2011年11月30日上午10点

地点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（北区食堂6楼）

与会人员：张国刚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），陈珏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），黄朴民（人大国学院副院长），陆建德（社科院外文所，《外国文学动态》主编），陈跃红（北大中文系副主任），杨惠林（人大副校长，）耿幼壮（人大《世界汉学》主编），贾宝兰（《读书》主编），吴莉苇（人大国学院副教授）

主持人：吴莉苇

陈珏教授介绍了“汉学的典范转移”（Paradigm shift，台湾翻译为“典范”，大陆习称“范式”），这是两岸清华大学为迎接清华百年校庆合作研究项目中的一个。该项目由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陈珏，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长江学者张国刚共同担纲。他认为，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（以法兰西学院，莱顿、柏林为中心的汉学）为第一次典范转移，从专业汉学到以费正清为代表开创的中国学为第二次典范转移。现在是第三次典范转移即以“中文”书写媒介与“西文”书写媒介并重，为变化的标志之一，因为语言、思维模式与“典范”三者之间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他认为，余英时中文著作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》、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都透露出一种处处入乎欧洲汉学与美国“中国研究”的“典范”之内，又随时超乎其外的崭新“典范”。这种“典范”决未停留在传统的“国学”范围内，却是一种以中文为书写媒介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新的研究“典范”，很可能成为下一次“汉学”与“国学”交融的典范转移的主体。此外，他还回忆了乐黛云先生参加带队参加世界比较文学大会的情景，乐先生是华人圈唯一一个进入国际比较文学并担任副会长的人。他还介绍了明年与乐黛云先生合作举办有关“Earl Miner（厄尔·迈纳）的遗产”论坛的计划。

陈跃红教授认为，范式转移实际上是主体的变化。汉学与费正清中国学都把中国作为客体，现在的范式转移是主客体的互动。这是由于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改变，作为研究者的身份也改变了。汉学拿来主义的方法论会使我们陷入被动。我们用什么方法呢？怎样把汉学与比较文学结合起来，必须从互为主体、互为他者的角度进行比较。要审查西方的研究方式合不合乎我们的需要。轴心时代

的东西没有联系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必须摸索符合我们实际的方法。他主张，必须扔掉考古学的放大镜和意识形态的偏光镜。

张国刚教授认为，我们的意识形态就像是给自己批了一个马夹，与所做的不符合。他认为，研究历史的多受西方影响，我们是被启蒙的，但我们也有普适价值，春秋时期我们就有了经商的理念，当下西方和我们都在搞市场经济，但是我们常受西方的指责，我们要脱掉意识形态这个马夹，俄罗斯已经脱掉了。他认为，全球化使全球生产一体化，因而主张要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研究除自己研究外，还要看西方人对我们的研究。

杨慧林教授认为，汉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的关联是先天的，二者的比较研究会很有启发意义。他认为，Allen 巴丢的 **politics of identity** 中的 **identity** 是一个动词，**God** 也是一个动词，是不断变化的，因此同时还应将神学、宗教学等也放进去。但他否认汉学回家的说法，是否只有同性恋者才能研究同性恋问题同样，是否研究中国最终被中国归化？

陆建德教授：巴丢的 **politics of identity**，**David Hume** 的人性论都认为 **I can never catch myself**。身份与外界是不断互动的，是 **succession of events**。汉学对于认识自己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比了中西方在“自我意识”方面的巨大差异，尤利西斯的自我是不断的进入到新世界，是流动不居的，波德莱尔也是如此，他们的身份都是灵动的。中国不善于反观自己，仅善于外在化，把外界美好的东西作为自己内心的投影，宋明理学的内心的贼是最难防的，自我反省固然重要，但过于坚固，所以也应该把自己敞开。

贾宝兰主编主张学术的平等。不要以为自己经济强大了，汉学、国学热会不会存在学术霸权主义？会不会造成对学术研究的阻碍？陈跃红教授回答道，需要“汉学热”里面的冷思考，现在是学汉学的越来越少、学汉语的越来越多，《红楼梦》的两个版本：**David Hawks** 和杨宪益、戴乃迭，在英国大受欢迎的还是霍氏版本。